

鄂豫边区的战略地位及其历史作用

张影辉

鄂豫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十九个根据地之一。它象巨人一样屹立于中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原前哨

鄂豫边区是在1938年10月日寇侵占武汉,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原地区建立的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的党组织正确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没有主力部队的情况下,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全边区“已由豫南的竹沟、鄂中的汤池、鄂东的七里坪三个战略基点逐步扩大;东起安徽的宿松太湖和江西的彭泽,西至湖北的宜昌,北始河南的舞阳叶县,南至幕阜山麓和洞庭湖畔,跨有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的辽阔地区”^①。

鄂豫边区虽跨五省边陲,但以河南和湖北两省为主。鄂豫地处中原,战略地位极其重要。陆路,平汉粤汉铁路纵贯南北,陇海线也与之交汇;水路,江淮河汉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山岳绵延,大巴山武陵山分界川鄂,桐柏山大别山雄峙鄂豫,大洪山矗立鄂中,幕阜山蜿蜒东南。鄂豫东面可直达皖赣、苏浙,西临川陕屏障西南,南联湘贵可趋两广,北抵冀鲁馆穀中原。既是四通八达之地,也是四塞八抵之区;既是敌后战场,也是抗日前哨。她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入敌人的心脏。

坚持鄂豫边区敌后抗战,对于全国抗战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武汉位居长江中游,是连结重庆、宜宾、上海和南京的枢纽。川陕是全国抗日的大后方,南京、上海是敌人对华侵略战争中制造政治阴谋、经济侵略及军事进攻的策源地,是日伪勾结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游击战争在长江两岸的发展,大大削弱了敌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影响,进而陷敌人策源地为孤岛和死城。

二、长江是敌人作战的主要战场。夏季水深时,上海的舰船可直航汉宜。日寇占领武汉后,长驱直入,长江更成为进攻我国心脏的主要交通线。另有平汉、粤汉铁路也是敌人联系侵华军队,策应南北作战的大动脉。人民游击战争大大地威胁了敌人的后方交通线,控制了敌人的南北交通和东西通道,逼迫敌人分散兵力保卫交通点线,削弱牵制其战斗力量。

三、发展与开辟中原腹地的游击战争和根据地,除直接威胁华中重镇武汉及其附近地区外,向东可以箝制敌人进而巩固苏浙皖抗日根据地的后方,向西可以配合国民党军队保卫川陕门户,向北构成保卫华北根据地的最前线的掩护战;向南发展则严重威胁湘赣。从战略上支援了四周的敌后战场,并配合友军包围日寇在全国占领的重要城镇。

四、鄂豫边区既有山岳地带,也有平原地区。这里除有丰富的矿藏外,农产品也十分丰富,有“两湖熟天下足”之说。武汉是我国内地的交通枢纽,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三国时代它就以商业繁华、军事重镇而著称。到了近代,又成为华中和西南部分地区农副产品的

集散地，也是通往出海口的要津。在这里坚持和发展人民游击战争，既可以打击敌人“以战养战”、进行经济侵略的阴谋，又可以依靠丰富的资源来充实敌后抗战的力量。

由于鄂豫边区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敌人同样十分重视对这个地区的占领。日寇为了攻占武汉动用约有空军万人、海军近十万人、陆军近二十五个师团的兵力。此时，日寇除在朝鲜配置一个师团、伪满配置八个师团外，国内仅剩下一个近卫师团^②，可谓倾巢而出了。日寇侵占武汉后，在武汉及其外围重要城镇屯以重兵，“经常驻有六个师团、两个旅团共十五万兵力，还有八万多伪军供其驱使”^③。敌人沿铁路、公路、长江、汉水、大小城镇设置据点，建筑碉堡，控制交通，并在其占领区拼凑伪政权、伪组织，实行政治上“以华制华”，经济上“以战养战”的政策，从而达到其“以华灭华”的战略目的。

国民党政府也十分重视这一地区。日寇占领武汉，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迁往宜昌、恩施，偏安一隅。国民党为维护西南门户，在这里“布下了第一、五、六、九等四个战区（1944年重划为第一、三、五、六、九、十等六个战区）。其中一线部队有七个集团军（其中有五个杂牌军）、十九个军、四十三个师的正规军和三个挺进军、二十一个地方游击纵队近四十万众”^④，占据着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幕阜山及其附近地区。

进入相持阶段，解放区战场逐渐成为主要战场。国民党为了保存实力，对日寇按兵不动，反而把注意力放在监视及消灭鄂豫军民身上。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从1939年开始，逐年都有“围剿”新四军鄂豫部队的计划和报告。皖南事变后增加到逐月都有这方面的报告。1941年，五战区则详细呈报一至五月第二十一、三十一两集团军反共战绩，向蒋介石邀功。为了配合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发动的反共高潮，顽固派对鄂豫边区也发动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围剿”，在每次“围剿”计划及其下达的命令中，均要求部队“在剿匪期间应避免与敌决战”，甚至要求“设法诱敌与奸匪发生战斗”^⑤。顽固派把抗日的人民军队诬蔑为“匪”，并视为其主要打击对象，国民党六战区还特发《防止奸党暴动、罢课、罢工及扑灭办法》，1942年又组织湖北各县“特别工作会议”，详细讨论与制定逮捕共产党人的办法，严飭各地贯彻执行。

从以上敌人和国民党顽固派在这一地区的战略部署，也证明鄂豫边区独立中原、地处抗日前哨，对夺取战争胜利具有伟大战略作用。

战 略 基 地

为了完成抗日战争胜利的任务，鄂豫军民在敌伪强大力量的对峙中不断去占领敌人阵地，发展根据地，使边区真正起到了抗日战略基地的作用。

人民的军队是创建和发展这块战略基地的有力支柱。武汉失陷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在敌后组织了一些小股的游击部队，这些力量还不够强大，并且极为分散，联络困难，没有统一的指挥。1939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原局派李先念率领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出现在鄂豫边区，汇合党的各路抗日武装，整编和扩大部队，使这里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1939年2月，游击支队首次打响了应山余家店之战。李先念派参谋长周志坚率领两个中队，于行军途中增援五战区和地方游击队，坚持奋战十二个小时，终于将二百余敌人击退，并击毙日寇二十余人。4月进攻云梦，收复云梦县城，这个胜利的消息轰动了鄂中，因为这是中国军队在鄂豫边区第一次攻克的一个县城；5月在礼山（今大悟县）的老山击溃敌人二百余人，伤亡三十余人；30日进攻黄陂蔡店，击溃伪第八军李汉鹏部队，继又将伪二十五师、二十一师全歼于孝感，这次战斗共击溃伪军二千余人，毙敌寇三百余人，俘伪军旅长以下官

兵二百余人。10月部队又打响了著名的“新街战斗”，13日拂晓日寇伪军共四百余人，向我京山县大山头驻新街的部队进犯，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将其击溃，缴获重机枪一挺，步枪数十支，日本战马六匹，敌伤亡一百八十余人。李先念司令员后来回忆说，这是一次“汉奸伪军闻之战栗的有名战斗”^⑥。这一仗大大激励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连白兆山中友军的报纸上，都用了特大号字登载了这个胜利的消息。经过大小百余次的战斗，部队得到不断扩大，至1940年1月发展“已达九千人”^⑦。1940年1月，根据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指示，这支游击部队统一扩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刘少卿为参谋长、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九个团）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了：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或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和发展”^⑧。

从1940年2月开始，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为恢复与建立全边区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了频繁的战斗。1940年初，鄂豫军民配合五战区冬季攻势，进行了襄花路的伏击战及京山县八字门之反扫荡战。5月。日军为巩固武汉外围，发动枣宜战役。敌由信阳、随县、钟祥等地集结，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分兵两路进攻襄河东西两岸和沙市、宜昌。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为牵制日寇西犯，保卫西南门户，积极战斗，主动袭击以上地区附近的黄陂、孝感、安陆、应山、应城及礼山境内之敌，并且破坏礼山小河溪至夏店、孝感花园至东阳岗、花园至应山、安陆至巡店等公路百余里。当国民党一二五师一个团被日寇包围在安陆赵家棚时，豫鄂挺进纵队调一个团主动驰援，使该团安全突围。与此同时，国共两军配合作战，相继攻克了明港、鸡公山、柳林等地，并将敌人包围在襄东地区。7月至10月，边区军民还进行了著名的保卫坪坝战役。坪坝位于安、随、京交界的白兆山附近，是通往鄂中各县的门户。日寇动用兵力二千、骑兵一千，先后三次进犯坪坝。我军民奋力反击，在一次战斗中，仅一个团就打退了敌人五次进攻，经过多次鏖战，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占领坪坝的企图。到1941年1月，鄂豫边区恢复和建立的政权已经“包括鄂中之枣阳、随县、钟祥、京山、安陆、云梦、孝感、应山、天门、汉川等十一个县及宜（城）、襄（阳）河东之一部分，河南之信阳、桐柏两县”，“加上了平汉路以东的一大块地区和汉（阳）、沔、潜等县的一大块湖沼地带”。^⑨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五师正式建制，至1943年是创建鄂豫根据地的最困难时期，也是在战略上达到包围敌人占据的武汉重镇的重要时刻。在这一时期，鄂豫军民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大小进攻与“扫荡”。如1941年11月、12月和1942年2月，新四军三打侏儒山，威振江汉。侏儒山位于汉川、汉阳、沔阳交界处。这次战斗全歼伪定国军第一师，击溃伪第三师，毙伤增援之日军百余人，俘伪军九百多人，缴获敌人的迫击炮、轻重机枪等大批军用物资，并且开辟了川汉沔地区，以后逐渐发展形成从西面对武汉包围的形势。因此“迫使敌人不能不用其第三、第四、第十三等三个师团及第十八独立旅团专门对付我们。敌人这三个半师团的兵力在我们袭击与牵制之下，始终不敢他调”^⑩。

1942年4月，新四军五师根据军部的指示，开辟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游击根据地。5月，五师十四旅分两路渡江挺进鄂南，建立了鄂大工委和阳大工委，并且成立了抗日政权，初步打开了咸、崇、蒲根据地的局面，从南面威胁敌人占据的武汉。

1943年2月15日，武汉日寇向长江与汉水间三角地区的国民党第一二八师进攻，沔阳以西地区失陷。新四军五师策应友军在汉川、天门进击日寇，3月8日，日寇发动长江南岸攻势，于岳阳、长沙渡江，进占公安、石首、华容一带。新四军五师在敌后发动对敌作战，接着转战于宜都、安乡、南县诸地，并先后于潜江、沔阳、监利、襄阳等地发动游击战争，有

力的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5月，日寇发动湘北、鄂西战役，新四军五师命令十五旅渡过襄河迅速向东南挺进，牵制敌人宜沙后翼。十五旅进入襄河南面汉川、沔阳，逐步形成从西南方向对武汉的战略包围。

国民党顽固派配合日伪军的扫荡，在这个时期对边区抗日军民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鄂豫边区军民，坚持团结抗日友军，正确执行对顽固派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粉碎了顽固派妄图消灭鄂豫军民毁我抗日长城的计划。陈少敏在谈到这种情况时十分沉痛地说：“使我英勇善战的五师，无法集中精力与敌人进行更多更大的战斗，这是很大的一个遗憾”^①。

新四军五师经过三年的战斗，开辟和奠定了包围与摧毁武汉日伪政权的前沿阵地，奠定了以后反攻武汉的基础。陈毅曾高度评价其作用说：“我五师李先念部活动于武汉重镇之外围及平汉之两侧，北则肩摩皖豫，南则襟带江汉，远出挺进，艰苦辛勤，独立支持战局者迄今亦已五年矣！”^②

1944年是中国人民开始战略反攻的一年，国际形势对日寇也十分不利，敌人制订了一个以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为目标的战略计划，企图使中国大陆的日军与孤悬南洋的日军联系起来，以加强日寇在太平洋战场的防御力量，于是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在日寇进攻面前，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溃败逃跑，短短八个月的时间丢掉了大小城镇146座。与此相反，中共中央坚持打击日寇收复失地，并且调集太行、太岳、冀鲁豫等地部分部队，深入河南西部创建抗日根据地。同时，新四军五师也奉命派出千余人，组成豫南游击兵团挺进豫南、豫东，收复失地。

由王震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组织的南下支队，于1945年1月29日到达鄂豫边区与新四军五师会师，从而为晋冀鄂豫皖五省开辟了一条通向陕甘宁边区的直达交通线，并扩大了解放区，使华北、华中、陕北的人民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了。南下支队在大悟山地区休整以后，新四军五师派出十四旅旅长张体学为首的两个大队，随王震和王首道领导的南下支队，经湖北的红安、黄冈于3月初抵通城、崇阳转入湖南，建立湘鄂赣根据地并成立湘鄂赣边区政府。

1945年开始，我军在继续巩固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斗同时，加强了对城市交通要道的占领和争取伪军伪政权的工作。据日寇投降时的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新四军五师对日伪的主要战斗达一千零三十余次，毙伤、俘虏敌伪军达四万一千一百余名。鄂豫边区的抗日武装拥有正规部队五万多人，民兵三十余万，成为全面反攻、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一支重要力量。

边区的政权建设是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的。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从1940年2月开始建立”^③，9月，在京山八字门召开鄂豫边区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按照“三三制”的原则，成立了鄂豫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办事处下设民政、财政、教育、人事、建设、公安、司法等处，辖鄂中、豫南、鄂东、天汉、襄西五个专员公署。联合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初步形成。

1941年3月底至4月初，在京山向家冲召开了鄂豫边区军政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选举正式成立了边区行政的最高领导机构——鄂豫边区行政公署。许子威为主席、爱国民主人士涂云庵为副主席。边区行政公署的成立，对于贯彻党的政策法令，支援部队作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42年，边区开展了全面建设工作，3月，在京山向家冲召开了鄂豫边区第一届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来自二十余县、二十八个单位的代表总数一百六十四人，到会者一百二十六

人，党员(中共)四十七名，非党人士七十九名。内有台湾代表一名，日本反战同盟代表一名，临时代表十名，聘请代表十八名；地主二十九名；资本家两名及前川康道尹姚文干(七十四岁老人)等”。④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原则，结合鄂豫边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并通过了《鄂豫边区施政纲领》。《纲领》共分二十五条，包括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及工业、农业生产，减租减息等问题，它是边区进行施政工作的大法。在这个大法的指导下，鄂豫边区全面开展了经济建设工作，逐步解决了抗日军民吃穿用及支援战争等问题。

八年抗战，鄂豫边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百业俱兴，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成绩。至抗战胜利时，它已拥有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千三百万人口、建立了七个专区、三十九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约有五十多个县(均不包括县城)的游击活动区。边区是在日寇包围和同国民党顽固派之间摩擦斗争中的“国中之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抗日根据地，一个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发展自己，赢得民族战争胜利的战略基地。

战 略 牵 制

抗日战争胜利后，鄂豫的部队与国民党在湖北宣化店进行谈判，最后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实现了中原突围。这一事件的胜利，对吸引国民党三十万大军，延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时间，起到了战略牵制作用，也有力支援了其他解放区和兄弟部队作好应付国民党内战的准备。

抗日战争胜利了，人民付出了牺牲，赢得了战争胜利，可是蒋介石却要从峨嵋山下来抢夺人民胜利果实。他要返回南京，东占华东，进入华南，控制华北，抢占东北，向全国布署反共、准备内战的兵力。但是鄂豫边区虎踞中原，看守着蒋介石出川的大门，扼住了蒋介石发动内战布署的咽喉，阻挡了国民党“摘桃子”的大军。蒋介石对边区恨之入骨，急欲扫除荡尽，因此鄂豫边区和新四军五师成了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第一个作战目标。日寇刚刚投降，蒋介石就迫不及待的调集了三个战区的二十多个师的兵力，大举进犯鄂豫两省解放区。国民党第一战区调动一部分兵力自西北方向沿陇海路两侧东犯豫西解放区；第五战区的部队沿平汉线两侧自北向南进犯豫中、鄂中、鄂东解放区，第六战区的部队自鄂南北犯进行配合。蒋介石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妄想淹没整个鄂豫边区。新四军五师和中原人民被迫奋起自卫。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主席就指出：“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们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⑤。为此，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示河南、湖北等战略区：“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⑥。决定要求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鉴于鄂豫所处地位的重要，中共中央为了加强鄂豫地区军事力量，于1945年9月命令王震、王首道率领八路军南下支队自湘粤赣北返、命令王树声率嵩岳军区部队南下，10月命令冀鲁豫军区的水西八团南下。12月24日上述部队与新四军五师会师于桐柏地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建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委、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原军区下辖江汉、鄂东、河南三个军区，共约六万人。与此同时，还组建了中原局。这些都极大地增强了中原地区的革命力量。

中原军区为了抗击四周的国民党军队，征得中共中央同意，将江汉军区、河南军区部队留在原地，主力撤出桐柏向平汉路东转移，拟到安徽五河一带逐步向新四军主力靠拢。当部

队行至湖北礼山县宣化店一带时，国共双方停战协定命令下达，规定双方军队应在1946年1月13日零点就各自位置停止待命。中原解放军恪守协定，立即停止行动，部队集中在宣化店待命。但是，各地国民党军队从未停止对解放区的袭扰和进攻，蒋介石竟下令要“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对共军严密封锁，分进合击，彻底消灭中原共军”^{①7}。自1月至5月15日，蒋介石在鄂豫方面竟调动了五个军十二个师的兵力，从长江以北、平汉路东、豫西南、鄂北等四面八方方向中原解放军扑来，把中原解放军包围在东西不到五十公里、南北不到六十公里的狭小地带。与此同时，国民党还不断增兵包围中原部队，形势极端复杂，中原战火一触即发。

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中原部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国民党在宣化店举行谈判。宣化店谈判是中原部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配合华北、华东、东北的斗争，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制止内战，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①8}的战略方针，同国民党进行政治上军事上针锋相对的斗争，用以达到争取和平，拖延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目的。在谈判的五个月的时间中，中原部队在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包围下，两军对垒，剑拔弩张，天天有战斗，日日闹磨擦，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斗争十分复杂。

宣化店谈判自始至终是在党中央、周恩来直接关怀和领导下进行的。中央对于谈判的方针原则等都作了具体的指示和安排。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也及时地向中央汇报情况听取指示。1946年3月，李先念派中原局代表任质斌和军调部执行小组工作人员肖健章到延安汇报部队情况，毛泽东指示，中原部队要用最大的毅力拖住国民党的军队，尽量争取拖住敌人更长时间。还说，你们在那里艰苦奋斗，牵制国民党军三十多万，掩护各解放区工作的展开，将来各解放区打胜仗也有你们的功劳的^{①9}。

在谈判中，我方与国民党共签订了三个协议：1946年1月下旬的《罗山协议》、3月下旬的《应山协议》、5月的《汉口协议》。这些协议虽然对国共双方军队在中原停止军事行动作了明确的现定，但是中共中央十分清楚，一纸协议只能起到揭露蒋介石的作用，而不能制止蒋介石要消灭中原部队的险恶用心。因此，中原突围势在必行。1946年3、4月间中共中央派周恩来、董必武先后到宣化店视察，并决定中原部队突围方案和解决突围的经费等问题。

1946年6月，国民党包围中原部队的兵力达十三个军三十余师，再次缩小包围圈。中原部队在继续揭露蒋介石内战阴谋的同时，电报党中央请示突围。中央要求部队“须作两个准备：第一个，争取一切可能向北；第二个，在向北不可能时，准备在国民党区域创造根据地”^{②0}。在形势继续恶化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46年6月23日再次给中原局电报指示：“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②1}。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大举进攻中原人民解放军，挑起了全面的内战。中原人民解放军奋力抵抗，打响了自卫战争的枪声，并且按照原订计划胜利地实行了中原突围，转入外线作战。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至中原突围，中原部队只有几万人，坚持鄂豫地区斗争达十个月之久。这支英雄的军队艰苦奋斗，英勇善战，在战略上牵制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为华北、华东、东北、西北等各地解放军作好迎击全面内战的准备争取了时间，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为此，毛泽东高度赞扬了中原部队的工作。他说：“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分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②2}。

（下转第29页）

义为特征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是他不可能建立科学的实践观的症结之所在。

但是必须指出，我们在评论费尔巴哈实践观的时候，一定要在指出他的缺陷的同时，充分肯定他那积极合理的方面。决不能因为他所讲的实践的主体具有生物学的性质，就说他所讲的实践活动只是人的生物学和生理学的一种自我保存和利己主义的活动；决不能因为他的认识论的直观性质，就否认他那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思想。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搞简单化。正像我们说黑格尔是个最大的唯心主义者的同时，又承认他的《逻辑学》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一样，对费尔巴哈的实践观也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

注释：

①③⑦⑧⑪⑫⑬⑮⑯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56、523、169、

156、109、526、528、89、91、108、139、133—134、598、248、270、178—179页。

②③④⑤⑥ 《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2卷，第111、111、7、111—112页。

③④⑤⑥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
①④⑤⑥⑦⑧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796、791、768、13、368、223、223、235、627、503—504、602、467、674、5、20、487、867、519、12、554—555、225、225、194、194、315—316页。

⑭⑮⑯⑰⑱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1、140、142、101、129页。

⑰ 转引自C·III·加巴拉耶夫：《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第143页。

⑱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⑳ 转引自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540页。

㉑㉒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8、41页。

(上接第60页)

注释：

① 《战斗在鄂豫边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册第1页。

② 《文汇年刊》，1939年版。

③④ 任质斌：《新四军五师是怎样成长壮大和完成她的历史任务的》，载《长江日报》1981年7月24日。

⑤ 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11006。

⑥ 李先念：《一年来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1941年。

⑦ 1940年1月3日刘少奇、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的报告。

⑧ 1940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给刘少奇、新四军、李先念的指示。

⑨ 陶铸：《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1941年1月15日)。

⑩ 刘少奇：《胜利的回顾和兴奋的展望》(1941年12月)。

⑪⑫ 陈少敏：《艰苦奋斗的三周年》(1941年)。

⑬ 陈毅：《新四军在华中》，载《盐阜大众》1943年7月7日。

⑭ 《鄂豫边区简况》(1942年11月)。

⑮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32页。

⑯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68页。

⑰⑱ 转引自肖健章：《宣化店的斗争与中原突围》，载《中原突围》第1册第113页、116页。

⑲ 1945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给中原局的电报。

㉑㉒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81、281页。

㉓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03页。